



蘇北民謠



平明出版社





2 039 4044 1

新 時 代 文 叢

第 三 輯

蘇 北 民 謠

白 得 易 編

編者：潘際明 黃 棠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時 代 文 叢

第 三 輯

蘇 北 民 謠

本 書 編 者

白 得

易

叢 書 編 者

黃 潘 際

袁 桐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中 路 二 五 弄 五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定 價 人 民 幣 二 千 六 百 元

版 權 所 有 · 不 許 翻 印

1953 年 3 月 初 版 1—5000 冊

94 定 價 頁 (文 學 · 藝 術)

寫在前面

收在這裏的一百幾十首民謠，是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我在蘇北地區工作時所陸續搜集到的。在空前緊張尖銳的三年多鬭爭中，我的戰鬥崗位是羣衆文藝宣傳工作，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對民間詩歌的深切愛好，我隨時留意和紀錄下羣衆的口頭創作。這些民謠，非常尖銳地提出了現實鬭爭中的重要問題，喊出了人民的心聲，貫串着明確的階級立場，加之，在形式上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雖然只流傳在口頭，但對當前偉大的鬭爭，卻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在緊張的敵後堅持環境中，我曾摻和着別的地區的民謠，編過兩本民謠集：“訴苦”“人心向着共產黨”，用羣衆自己的創作來教育自己，是起了一定的宣傳教育作用的。其後，我又陸續搜集了一些。比之自己的作品，我是更其實愛羣衆自己的創作，一直把它帶在背包

裏，保存下來。解放以後，各地出版了不少的民謠集，蘇北的民謠，雖也散見在各地出版的書裏，但卻是零碎和少量的。翻翻我幾年來的筆記本，其中極大部份是沒有發表過的，而原先兩本書早已絕版，其中“訴苦”一書，我自己也找不到了。因此，我敢於把這些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這些民謠，是羣衆在劃時代的革命戰爭中寫下的史詩，在人民已經取得了勝利的今天，追憶起過去艱苦卓絕的戰鬪，是有着很重大的意義的。至於對詩歌工作者來說，研究和取法這些爲羣衆所喜聞樂見的民謠，對我們創造新的詩歌民族形式是非常有益的。

本來這個搜集整理工作，應該由很多人集體來做，現在在這樣的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我只得先把所搜集到的一點，集印出來，作爲一個開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更完整的“蘇北民謠”及其他各省的民謠專集。

二

爲了使讀者更了解這些民謠產生的背景，需要在這裏簡略地介紹一下蘇北的社會經濟情

况和對敵鬪爭的歷史。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和壓迫是慘重的，封建地主和富農對農民所採取的三種主要剝削形式：地租、高利貸、雇工，在第一輯的民謠裏，都有着深刻的反映。蘇北的北部，接近於偏僻的內地的鄉村，其階級對立關係，主要表現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鬪爭。蘇北的南部，一方面因為接近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心上海，一方面又因為資本主義比較發達，所以其階級關係更要顯得複雜些。例如流行在南通的兩首民謠：

永安一開廠，
花價就要淌。(三七)

鄉下人常吃苦，
挑來挑去九斗五。(三六)

前者就是棉農對官僚資本主義提出的抗議，後者則是農民不滿於舊日的城鄉對立，商業資本家的中間剝削。“仁慈，仁慈”(三五)諷刺了美帝的文化侵略，“和平軍嚙沒東洋人：”(四二)揭穿了那些發“國難財”的漢奸、軍閥、

官僚資本家的面具。這些雖說在整個民謠中搜集得太少，但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它多方面的反映了舊中國複雜的階級關係，並且傳出了人民強烈的憎惡。其次，諷刺和詛咒反動政府和“遭殃軍”的民謠，佔了很大的比重，這正是非常自然的。本書第二輯的民謠，大抵可以歸併在這一類當中。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不是在旁觀和等待之中來諷刺和詛咒的，而是把它當做尖銳鬭爭中的宣言和口號。這種諷刺、詛咒，就直接成為鬭爭的武器之一。蘇北是老根據地，人民在共產黨和民主政府長期的教養之下，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艱苦鍛鍊。因此，當蔣匪幫開始向解放區進攻，人民站在愛國自衛的前線，全力的支援了解放軍，造成輝煌的“七戰七捷”。“毛主席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贏”這正是在一九四六年“五四”土改以後，人民歌頌着農民翻身和解放戰爭頭一個驚人勝利的詩句，這意味深長的語句，傳達出人民衷心的感激和必勝的信心。爲了執行毛主席的運動戰的戰略原則，我們主力，在給敵人重創以後，撤離了蘇北；

從一九四六年冬，蘇北就轉入緊張艱苦的敵後堅持局面。鬭爭的尖銳，超過了抗日戰爭中日寇的“清鄉”，蔣匪軍集中了優勢的兵力，配合着自衛隊、“還鄉團”（地主反動武裝）向我敵後軍民，進行長時期的反覆不斷的篋梳式的“清剿”、“圍剿”、“兜剿”。但是經過鍛鍊的英勇頑強的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相反的，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表現了高度的英雄氣概，發揮了羣衆的鬭爭智慧，創造和運用了多種多樣的方式和敵人進行頑強的鬭爭。真是前仆後繼、不屈不撓，青年、老人、婦女、兒童，都一齊投入了戰鬪，民兵深入據點，老人掩護幹部，婦女活捉俘虜，兒童騙取敵人，到處進行着可歌可泣的鬭爭。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大軍渡江，才結束了這一敵後堅持的局面。在所有老解放區中，蘇北解放區是淪陷最早，解放最遲的，鬭爭的長期性、多樣性的特點，也就必然的反映到羣衆的創作中，這就是爲什麼這一類反“清剿”的民謠，佔了全書很大一個比重的緣故。這也就成爲本書的一個鮮明的特色。實際上，這種戰鬪性概括性很強的民謠，是更

爲豐富大量的，這裏搜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一九四七年秋冬，正是解放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我們又進行了深入的土改複查運動，肅清了蔣匪在解放區的社會基礎，千百萬農民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在面對面的階級鬥爭中，羣衆的歌謠不再停留在諷刺和詛咒上，而是對階級敵人展開了嚴厲的抨擊和責問，他們在切身的體驗中，了解要保衛自己的翻身，只有打垮封建總根蔣匪幫，所以明確的提出了“打到南京去，蔣介石沒落走”(一一五)的口號來！

隨着對新的生活的喜悅，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感激，人民以更高的熱情來堅持鬥爭，支援戰爭。蘇北全面解放後，千百萬民工，又湧上渡江的前綫，他們的口號是：

打到江南去，
解放全中國！

三

在實際鬥爭中，民謠起着宣傳教育作用，證明它是階級鬥爭的有力的武器，這樣的實例

是很多的。

在敵後鬭爭最艱苦的時候，敵人會利用了局部的暫時的優勢，用“自首”來麻醉、欺騙我們的幹部和羣衆，針對敵人這一毒辣的陰謀，當時就出現了這樣的民謠：

“自首”、“自首”，
魚落貓兒口，
喵唔一聲，
叫你變鬼。（七六）

這是我參加一個小型的鄉幹部會上聽到的，它生動形象地揭穿了敵人的“自首政策”，起了警惕和教育的作用。

敵人爲了破壞我解放區，動搖人民敵後堅持的信心，造謠欺騙羣衆，迫使一些認識不清的人跟他們搬到據點裏去。結果，一些被騙上據點去的人，離開了田地，受到蔣匪幫的敲榨勒索，加上蔣佔區的物價飛漲，使這些人充了家，不得不狼狽地回來。於是在羣衆中又流傳了：

搬家搬家，
搬得充家。

實船出去，

空船回家。(七七)

這就進一步提醒了羣衆，打擊了敵人的陰謀鬼計。

正像羣衆把它豐富的生產、生活經驗，集中在“農諺”“莊稼話”“民諺”裏面一樣，在激烈鬭爭的年代，人民也把他們的鬭爭經驗，集中在新的民謠裏，及時的流傳開去，“無遠不屆”的起着戰鬭的作用。

民謠的戰鬭作用還不止此，它還和敵人進行更爲針鋒相對的面對面的鬭爭。如在一九四七年一、二月間，敵人在瘋狂的向我進攻，有不少地區，我們的陣地暫時撤退了，或轉變成爲隱蔽的狀態，無恥的敵人，也用“流言”(敵人也會運用民謠這一形式，無恥的造謠，但總是因爲內容荒謬，受到羣衆的唾棄和仇恨，到底只得像放不響的爆竹，丟進灰堆去完事。)來譏刺我們，他說是：“蠶豆有眼，伙計做老闆；蠶豆入土，幹部躲得苦。”但人民是決不示弱的，馬上在敵人的“流言”後面，加上了新的內容，反過來沉重的打擊了敵人。那加上

了新的內容的民謠是這樣的：

蠶豆有眼，
伙計做老闆。
蠶豆入土，
幹部躲得苦。
蠶豆開花，
幹部歸家。
蠶豆結莢兒，
還鄉佬兒翹辮兒。（八七）

同樣的事情，還表現在對地主階級的土改
關爭中，土改前，在淮安縣石塘區有個姓林的
地主，自己誇口說：

窮了我林百萬，
海乾石頭爛。
驢駝鑰匙馬駝鎖，
那能窮到我？

土改時，農民說：

天動地搖打個滾，
如今佃戶做主人，
看你百萬不百萬，
海乾石頭爛不爛？（一一四）

如果說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思想戰線上和反革命思想展開激烈的鬭爭，那麼這些就是革命的人民對反動份子展開的舌戰，羣衆以勝利的信心來關懷這些鬭爭，這些民謠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的鬭志。

四

除去民謠的戰鬭性，就應該數到它的羣衆性。它爲羣衆普遍的掌握、喜愛，在各種場合被運用着。它的編成：有的是一個人編說，經過別人的提煉增刪而後流傳，在流傳中還不斷的加以補充和改變；有的則是幾個人編湊的集體創作。

爲了把它和民歌區別開來，這裏所指的民謠，是指那些不一定能唱，甚至只能唸不能唱的短小精煉的口頭詩歌，因爲它形式簡短，句法自然，比之民歌，它不受字數的限制，更接近於羣衆的口語（民歌爲了歌唱的原因，字數上有一定的限制，在徹底口語化上，比不上民謠），所以更易爲羣衆所掌握。它不是活在歌唱中，而是活在語言中，流傳的面是非常廣的。例如這書第四輯中的：

好得新四軍幫你忙，
又有被單又有床。
好得新四軍待你好，
又有糧來又有草。（一一七）

就是一個不識字的七八十歲的翻身農民老太口編的，其中的童謠（四四、五九）則是兒童自己編的。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有一次我們替上冬學的農民編教材，全部採用了歌謠的形式，約了一些農民讀給他們聽，他們提出不少意見，後來，他們幾個人各人湊幾句，就自動的編起來了，的確是很好的民謠，可惜字句我忘記了。羣衆往往叫這些編出來的東西叫做“順口溜”、“快板”，其實這和民謠是一個類型的東西，所不同者，是民謠更短小精悍，節奏更明朗，概括力更強，更便於記憶和流傳。

民謠運用的普遍是出乎我們的意外的，在開會、在講話的時候引用着它，在呼口號時喊到它，也有作為標語，貼在牆上（有的則作為牆頭詩而出現），下面的民謠：

白米餅，噴噴香，
毛主席老人家請你嚐。

不是你幫忙

我家那有米餅香。

則是翻身農民老太獻給毛主席的祝詞。

在蘇北有一種習俗，每到元宵或二月半的晚上，千家萬戶不約而同的要在田岸上的枯草叢或是草路上放起野火來，叫做“放燒火”，一面嘴裏還要大聲呼喊，以前喊的是些損人利己的吉利話，像：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別人家榮銅錢大（讀度），

我家榮盤籃大。

別人家榮爛去了，

我家榮賣去了。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但是現在卻有了新的內容了，我聽到孩子們一面放燒火一面喊着：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日本鬼殺我，
“和平軍”紮我，
“中央軍”做我，
新四軍救我，
正月半，
二月半，
放燒火！”

民謠，就它本身存在的優點來講，這樣的被普遍運用，是不足為奇的。但與其說它在普遍被運用，不如說羣衆在感情激動的各種情況下，需要寫詩，就自然而然的採取了這一熟悉的形式，也就是說羣衆的詩歌，都充份具備着民謠的特點，我們就管它叫民謠。

五

最後，我想從羣衆詩歌工作的實踐中，談一談民謠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北是牆頭詩流行的地區，牆頭詩和民謠有着深厚的血緣關係，單從下面幾點就可以看出來了：有不少民謠被作為

很漂亮的牆頭詩寫在牆上；有一些好的牆頭詩則流傳成爲新民謠；有一時期，凡是寫牆頭詩的都要先來兩句民謠開頭，而民謠，我以爲正是民謠的一種原始的形式，這些說明了民謠給了牆頭詩以決定性的影響，這是因爲在內容和形式上，二者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在解放戰爭中，牆頭詩並沒有如預期的蓬勃的發展起來，這與其說是提倡者離開了蘇北，當地作者的主觀努力不夠，還不如說有更客觀的原因。首先，從全而淪爲敵後，敵人每天下鄉燒殺搶掠，遇到寫有這樣標語口號的房子就燒、拆，羣衆是勇敢而聰明的，並不想爲了寫一兩首詩就把房子燒光，還應該運用更巧妙的戰術。加之，在對敵鬭爭中情勢的變化是很迅速的，要及時提出不同的具體行動口號，因此，用鍋鏟寫在牆上的詩來不及跟着變，沒有這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來粉刷、書寫。最後，因爲寫作者限於認識水平，往往寫出有原則性錯誤的東西來，起了相反的作用，即使經過基層政權的文教部門的審查，也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很明顯，由於鬭爭形勢的需要，舊